

讲好老区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运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运城日报 合办

本版组稿:本报记者 苏黎原
见习记者 曹欣怡

组建武装坚决抗日 屡战屡胜名声大振

令狐兴中：获两枚国家勋章

令狐兴中(1910—1985)，乳名东河，平陆县三门镇坡底村贺峪沟人，高小文化，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先后担任平陆县游击队十支队长、太行三分区支队六大队大队长、太岳三分区五十八团参谋、太岳三分区司令部参谋。他亲历解放运城、临汾、晋中、太原战役，曾获“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平陆县文史馆馆长、国营平陆石膏厂厂长。

1941年，令狐兴中接到上级党组织要求组建抗日武装的命令，就和史德山用党支部筹借到的钱买了1支步枪，又用群众从战场上捡到的4支步枪和一些手榴弹，组建了抗日武装。

1941年7月，因汉奸告密，令狐兴中在日军抓捕，被组织营救得以逃脱。同年9月，令狐兴中再次被国民党当局抓获。敌军对他严刑拷打，要求令狐兴中交出枪支。在被敌人押着去找枪支的路上，他靠着熟悉地形，趁机逃走。

1941年冬，县委决定将令狐兴中领导的游击队编入平陆支队二大

队，由令狐兴中任工作人员，主要从事军队中党的工作。1943年6月，令狐兴中所在部队编入由共产党员薛勤领导的挺进五支队，列为六中队。

1942年初，令狐兴中受命回贺峪沟一带重新发展一个新的抗日中队。刚开始组建时，这个队伍的队员不足10人。经过努力，他吸收了周金山等20多名战士，部队的战斗力得到极大提高。他领导的队伍纪律严明，一心维护人民利益，很快就在地名大振。

1943年2月，根据中共平陆县委指示，令狐兴中的抗日中队再一次编入薛勤领导的挺进五支队六中队。

1943年6月，五支队在同蒲铁路的峨嵋岭接应十支队时，与伪铁路警察发生冲突。不料有汉奸向日军告密，日军立刻集结运城、安邑、东郭、庙前、夏县的四千余名日伪军，将五支队和十支队全部包围。十支队多为夏县人，熟悉战场地形，向北从王峪口完成突围；五支队多是平陆人，不熟悉战场地形，只有少数人冲突突围，伤亡很

大，支队长薛勤也不幸被捕，壮烈牺牲。经过休整，令狐兴中的队伍只剩下20余人和15支枪。

一日，国民党一战区二十一纵队总队长杨振邦率部队从河南渡黄河，途经尖坪渡去中条山。杨振邦的部队经过日军多次围剿，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经过令狐兴中的劝说，两个部队合二为一。新队伍共有38人、32支步枪、2挺轻机枪。另有16人不愿归编，返回了河南。很快，令狐兴中把游击队的规模扩大至60人，拥有50余支步枪、2挺轻机枪。经过集中训练，队伍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1944年初，令狐兴中的游击队被编为六大队，令狐兴中任大队长，赵连成任指导员。不久后，在六大队的争取下，日伪八政中心据点的日伪军投诚。同年6月，他们消灭日伪据点一个小队，俘虏敌军中校张桐轩及下属20余人，缴获10支步枪、1支手枪、1架望远镜。7月，他们在槐下村伏击日军，击毙1人、俘获1人，缴获1支步枪。8月，他们于坡底胡疙搭击溃太宽河伪军，火烧敌军炮楼，俘获10名日

伪军，缴获10支步枪、2000斤食盐。同月，他们在甘山阻击日军增援太宽河据点，击毙6名日军。很快，这支游击队在当地名声大振。

1945年8月，十支队同吴仲六领导的四支队统编为中共太岳第五军分区第五十八团，令狐兴中被任命为团参谋。1946年任太岳第五军分区外交参谋。1947年任万荣县独立营副营长。不久后，他调至太岳第三军分区五十九团任副营长，后转任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第八纵队二十二旅五十五团三营副营长。1949年，他调至六十军一七八师五三三团三营任营长。1949年下半年到1952年，他先后任山西步兵四团团部党支部书记、临时党支部书记、一团军务股长、西南军区公安师一团三营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军务股长、三营营长。1953年，调至茂县军分区军械科任科长。1958年，调任汶川县武装部部长。

1958年，令狐兴中奉命转业到地方工作，任平陆县文史馆馆长。1962年，他调至国营平陆石膏厂任厂长。1985年1月，令狐兴中因病去世，享年75岁。

靠一双小脚站岗放哨 凭一己之力撑起家庭

“有觉悟的家庭妇女”廖梅娃

廖梅娃(1910—1986)，夏县中留村人。

廖梅娃幼年丧父，15岁时嫁给大侯村的孙雨亭。婚后第二年，孙雨亭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时回到家乡宣传革命道理，并且组织农民协会开展打土豪、惩污吏等活动。在丈夫的影响下，廖梅娃逐渐懂得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从此，她总是热情接待来家里同丈夫研究工作的同志们，并为他们站岗放哨、传递消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处抓捕和屠杀共产党人。这时，孙雨亭被学校开除。他便回到家乡开展秘密活动。

只要家里开展秘密活动，廖梅娃就主动拿着针线在门口瞭望。为防止意外，她还在自家和邻居家共有的围墙上搭起一架木梯。如果敌人到家里搜捕，丈夫和其他同志就可以攀梯逃脱。

面对敌人的疯狂追捕，孙雨亭将活动地点转移到廖梅娃的娘家中留村和舅家石桥村。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孙雨亭担任中共夏县临时县委书记，廖梅娃也忙碌起来。她不仅把来家里的革命同志当作亲人，而且还积极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这样的生活持续了7年多。经常出入孙雨亭家的阎子祥、特派员霍传秀、李云等同志都称她是“有觉悟的家庭妇女，没

有参加组织的革命同志。”

1938年初，日寇进犯晋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决定由山下转移到中条山腹地。廖梅娃及全家老幼不得不跟随丈夫弃家避难，走进山林。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廖梅娃靠着一双小脚，艰难地奔波在郝家岭、砖庙村、蔡家窑头一带的山山岭岭。

中条深山的冬季，冰封雪裹，寒风刺骨。廖梅娃一家的日子虽过得艰难，但依然将自己家的被子送给游击队。她看到有些穷人衣着单薄，便主动把为丈夫做的棉衣送给他们穿。战士们受了伤，她就主动去护理照料。此外，廖梅娃还走村串户发动妇女为游击队做军鞋、煮鸡蛋，踊跃支前。

1939年冬天，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疯狂围剿。中条山区的党组织和队伍决定向太岳根据地转移，奔赴抗战第一线，并且动员领导家属返回老家。

夜深人静，即将离别的廖梅娃和孙雨亭对坐在窑洞里的炕沿上，眼含热泪，思绪万千。临走时，孙雨亭握住廖梅娃的双手，深情地说：“家里的老人和四个孩子从此就托付给你了。”廖梅娃心里有很多话想对丈夫说，但话到嘴边，却只剩下了一句：“你放心。你能不能把我14岁的弟弟廖保家带上，一起北上抗日……”

临行时，她的公公对两个儿子说：“你们兄弟俩要带着保家好好干，打不走日本人就不要回家。”就这样，廖梅娃怀抱刚满周岁的小儿子，拖着2岁的女儿，回到了被日寇焚烧过的老家大侯村。当时家里没吃没喝，全靠廖梅娃一人张罗。为了维持全家生计，她靠外出乞讨维持生活。等到开春时，她向亲友借种籽、犁耙、牲口，以耕种为生。

一天夜深，廖梅娃在家中纺线，突然传来儿子的惨叫声。她本能地放下手中的东西，跑到院中，见到一只饿狼叼着孩子正向院外走。看着孩子痛苦挣扎，廖梅娃鼓起勇气挡在饿狼面前。或许是为母则刚的豪气震慑了饿狼，饿狼与廖梅娃对视了一会，放下孩子跑了。

从此，廖梅娃便下定决心，宁可自己累死，也要保护孩子们的安全。除了下地干活外，她还设法借了一些棉花，起早贪黑纺线、织布。每织好一匹布，她就拿到庙前、大洋、捻掌、东张的集会上卖。饿了，就啃几口自带的干粮；渴了，便向店铺讨碗凉水。就这样，廖梅娃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在近乎废墟的院子里，重新盖起了房子，盼望着日夜思念、南征北战的丈夫胜利归来。

然而，敌人不会轻易放过抗日家庭。一天傍晚，廖梅娃和孩子们刚从地里劳动回家，日军和汉奸就

将她的公公抓去，逼迫他叫两个在外抗日的儿子回家。这位正直的老人没有答应，敌人便对他严刑拷打、百般折磨。直到老人奄奄一息，敌军才放其回家。公公回家后，廖梅娃细心照料，四处求医买药为公公治病疗伤。

新中国成立后，廖梅娃总算过上了安稳日子。但由于早年过度劳累，1984年，廖梅娃由于脑血管硬化，卧病在床。在县城当工人的儿媳韩改正毅然辞掉工作，像廖梅娃当年照顾年迈多病的婆婆一样，精心照料廖梅娃，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1986年10月26日，77岁的廖梅娃离世。大侯村和周围村的300多名村民知道后，自发前来祭奠。县共有76个单位的负责人率班子成员前来吊唁。她的小叔子、周总理的机要秘书、国务院纪检组组长孙岳，从北京发来唁电。

孙岳在唁电中深情地表示：“我嫂子一生坎坷，艰辛备尝，她对家庭、对父母、对子女的贡献比我们都大。她对抗日战争、对革命事业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在艰难环境中彰显了一个华夏女性的高风亮节……不管是新标准还是旧标准，也不管是城市标准还是农村标准，我嫂子都堪称楷模！”

孙雨亭也专程回到夏县，为这个家庭的有功之臣献上自己的哀思……

弹无虚发“点名”毙寇 重伤不死再上战场

新绛“神枪手”卫金柱

卫金柱(1922—1945)，新绛县柳泉镇孙家村人。他作战英勇，多次立功。1945年8月，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牺牲时年仅23岁。

1938年3月，新绛沦陷。15岁的卫金柱目睹日本侵略军暴行，报名参加新绛县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

1938年10月，新绛县武装自卫队改编为山西政治保卫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卫金柱被编到三支队九中队当战士。

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山西政治保卫队的作战范围由新绛扩展到稷山、乡宁、吉县、河津、汾城、襄陵等周边7县。

1939年3月的一个夜晚，山西政治保卫队第三支队准备向襄陵县景村的一个日军据点发起进攻。由于叛徒告密，部队反遭敌军包围。

突围战中，卫金柱作战英勇，表现出色。同年9月，山西政治保卫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合编为山西新军二

一三旅，卫金柱被编入五十七团三营九连。

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后，为突破敌军进攻，我军以连队为单位，开展游击战争。卫金柱所在的九连在乡宁县堰子村与日军进行激战。卫金柱英勇机智，枪法精准，弹无虚发，凭借一人之力，击毙16名日军。由于队伍装备不足，多数队员不幸牺牲。

队伍撤出后，他和十几个战士转战于山地密林。徒步数百里后，他们终于在晋东南沁源与大部队会合。

1940年8月10日黎明，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二九师一部和山西决死纵队三个团向驻榆社日军的其中一个大队展开猛烈进攻。驻沁县日军派兵增援。我军五十七团把增援日军死死地阻击在沁县与榆社之间的东石岩村附近。

傍晚，二九师与决死一中队攻

克榆社城，歼灭守城日军。增援日军在撤退时，被我军全部歼灭。

在这次战斗中，卫金柱再次发挥了“神枪手”的威力，一人击毙15名日军。战后，八路军总部特别号召全军学习卫金柱“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

1942年4月，卫金柱护送一批重要物资和人员返回太岳区。途经“白晋铁路”封锁线时，陆续有人掉队。卫金柱既要守着患病多日的指导员芦中和，还要负责断后和收容任务。队伍行至途中，被100余名日伪军赶上。经过一场恶战之后，卫金柱和芦指导员被捕，被押往县城的日军监狱。

在狱中，二人历尽酷刑，坚贞不屈。敌人对他们失去了耐心，在沁县城南郊外一个崖坎上，挥刀向他们的脖颈砍去，并将两人推下山崖。

不知在悬崖下昏迷了多久，卫金柱苏醒过来。他胡乱用衣服裹在脖子

上保护伤口，缓慢地爬到附近一个打麦场的麦秸堆里。房东老大娘发现了，将他送到驻扎在沁县南泉村的卫生队。

太岳日报以《歌不死的卫金柱》为题，刊登了他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军向卫金柱同志学习。

1943年，卫金柱升任排长。一次，卫金柱率部队与日军作战，排里牺牲了不少人，只剩卫金柱一人与敌周旋。趁着天黑，他从一个山头绕到另一个山头，频频袭击敌军，独自一人坚持了一天一夜。战后，卫金柱升为副连长，随后，又升任八纵二十四旅七十一团连长。

1945年8月，我军命令日军就地缴械，盘踞在夏县黑虎庙的日军拼命顽抗。卫金柱率连如猛虎一般，扑向日军据点，仅半小时，歼灭敌军。

在这场战争中，卫金柱身负重伤，光荣牺牲。

刘刚(1915—1945)，原名董子俊，翼城县辛安村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7月，他被条东地委派到绛县担任抗日政府教育科长。1943年春担任四区区长。1945年6月30日，他在葫芦泉事件中被捕牺牲，时年30岁。

刘刚出生在翼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参加革命后，他为隐蔽身份，化名刘刚。

刘刚自幼聪明好学，1933年翼城县全县八个高小毕业班会考时，在300余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同年，他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

在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刘刚接受了革命思想。中学毕业后，刘刚先后在翼城县任小学教员、区牺盟会特派员、县公安局指导员、县民运工作队负责人等职。

1938年农历正月，日军占领翼城。刘刚任县总动员委员会秘书，积极宣传统一战线思想，发动群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减租减息。同年，刘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后，在白色恐怖下，刘刚和翼城县委书记张天合保持秘密联系，并担任五区区委委书记。他机智顽强地开展党的工作，使各村党组织先后得到恢复，并且持续开展反奸抗日斗争。

1940年秋，刘刚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要求以建立阎五专署保安支队的名义，组建一支受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取得阎五专署同意后，他召集150余名农民子弟，组建起阎五专署保安支队三大队，并担任大队长。

这支队伍成立不久，阎五专署通知刘刚到浮山县柳曲村训练。

受训没几天，他得到阎五专署要对这支队伍进行改组的情报，便借故返回翼城。请示县委后，刘刚将这支队伍解散，让队员各自回家。

阎五专署得悉后，随即下了通缉令，四处捉拿刘刚。为了保护刘刚，组织将他调到晋豫区条东地委工作。

1942年7月，晋豫区条东地委派刘刚到绛县担任四区区长。当时，四区的平川区被日寇占领，大交镇、安峪镇等地都有日伪据点。顽匪陈子文部队以续鲁峪村为根据地，控制着冯村岭村、长岭岭村等一带山区。

面对不利形势，刘刚没有畏惧。他先以迴马岭、炭园河一带为立足点，昼伏夜出，在四区一带活动。1943

年3月，他把立足点转移到翼城县泉头村。该村距陈子文占领的北坂村仅4公里。

刘刚和助理员、通讯员3个人住在泉头村，与村民同吃同住，下地干活。白天，他们开展生产自救，宣传党的政策。到了晚上，他们组织民兵进行抗日反“扫荡”斗争。刘刚不怕辛苦，翻山越岭到四区的丁家凹、冯村岭、南北坂、冯村等村庄开展工作。此外，他经常带领泉头村民兵郭有道、郭九贤等人，到日寇据点附近的村庄宣传抗日，为我军催收公粮。

不到一年时间，四区的斗争形势发生转变。区政府由3人发展为12人，武装力量由1支枪支发展到4支枪支。此外，他们还在十几个村建立联系点。

当时四区流传着一首歌谣：“八路是抗战的，五十三军是逃难的，陈子文是捣乱的。”许多干部、群众，即便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冲破日伪、阎顽的严密封锁，把粮食、土布、军鞋等物资送到抗日民主政府，支援抗日斗争。

1944年的一个晚上，陈子文派出一个连的兵力，包围了四区政府驻地——泉头村。通讯员李孝风被捕。在群众的掩护下，四区干部安全转移。

1945年3月至4月，陈子文多次对泉头村进行武装偷袭。在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陈子文部队次次扑空。

1945年5月，为配合我第十七团、第二十团和县大队，刘刚带领四区干部，在下柏村、三晋峪一带围剿陈子文部队。

三晋峪战斗结束后，刘刚又带领四区干部到北坂、续鲁峪、冯村岭、长岭岭建立村政权和民兵组织，以扩充区干部。仅一个多月，区政府和区中队就扩展到23人，拥有19支枪械。

1945年6月30日晚，陈子文部队勾结阎顽十九军的一个师，包围了四区政府驻地——葫芦泉。刘刚等同志在突围中与敌人展开血肉拼搏，终因寡不敌众被捕。

被捕后，陈子文部对刘刚施以残暴酷刑，想从他的口里获取绛县党政军的消息。刘刚坚贞不屈，视死如归。面对残暴的敌人，他怒斥道：“你们破坏抗战，良心丧尽，绝没好下场！”

面对敌人的枪口，刘刚挺起胸膛，高呼道：“中国共产党万岁！抗战必胜！蒋阎必败！”随后，壮烈牺牲。

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被敌包围中弹牺牲

武健：身怀六甲坚持战斗

武健(1922—1943)，女，原名岳润清，临猗县牛杜镇人，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先后任太岳区职工学校政治指导员、太岳区工商局合作工作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武健只读了几年小学，抗日战争就爆发了。1938年7月，16岁的武健跟随堂姐岳侠参加革命。同年秋，武健任稷王山区妇救会负责人。“十二月事变”后，武健随山西新军二一二旅转移到太岳区沁源县。

1940年3月，她受组织派遣，到大行区武乡县蟠龙镇抗大总校学习。1941年年初，她重返太岳区，在太岳区职工学校任政治指导员。随后，她被调任为太岳区工商局合作工作队政治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

1943年春，武健率合作工作队队员在土敏县端氏镇(三八六旅驻防地，现沁水县)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工作。

1943年4月17日拂晓，日军兵分三路，从阳城、沁水、高平合击端氏镇。敌人的这次行动十分诡秘，当他们将行至村边，才被工作队岗哨发现。安全撤退已来不及，只能分路进行突围。

此时的武健已有8个多月的身孕。有同志看见武健挺着大肚子，行动不便，便要保护她一起向外冲。武健担心拖累队友，说：“情况紧急，要减少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先走。”等大部分干部、群众撤出后，她才由

石如玉搀扶着向安全区域转移。

武健与石如玉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石如玉扶着她往外跑，但是始终没有跑出敌人的包围圈。

天刚亮，敌人就开始搜山。她俩本想爬过一个土坎，转移到另一个山头。挺着孕肚的武健身子重，上不去，石如玉就把她往上推。就在此时，她们的身影被敌人发现，敌人开枪射击。一梭子弹打来，武健中弹，从土坎上滚下来，身上鲜血直流。武健忍着剧痛，对石如玉说：“我不行了，你把文件藏好，带着这把手枪，赶快跑吧！”石如玉藏好了文件，为武健包扎。武健催石如玉快走，嘱咐道：“先不要把情况告诉成林(武健的爱人)。”石如玉坚持要与她一起撤离，表示：“我不能丢下你不管，咱们死也死到一起。”

正在两人推拉之际，敌人向她们围了过来。无论敌人问什么，她们都拒不回答。

敌人看到武健已经奄奄一息，便狠狠踢了她几脚，押走了石如玉。由于受伤过重，武健不幸牺牲。

当地抗日政府和群众得知武健牺牲的消息，悲伤不已。他们用棺材装殓了她的遗体，把她在和在此次战斗中牺牲的工作队副队长杨文采的遗体，共同安放在一个窑洞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武健的名字被镌刻在太岳烈士陵园纪念碑上，供后人瞻仰。